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之变迁

——基于公共合约观的描述与分析

陈汉文 韩洪灵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会计系 361005)

【摘要】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治理问题在 21 世纪重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按照公共合约观构建了一个融利益关联度、期望差距、政府管制参与度、合约的技术特征及时间在内的五维分析框架,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之变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以期能够梳理变迁过程中所折射出的历史逻辑和规律。

【关键词】 注册会计师 职业道德准则 变迁 公共合约

一、引言

世界范围内财务舞弊与审计合谋案的发生,使得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治理问题在 21 世纪重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陈汉文,1997;陈汉文、韩洪灵,2004)曾分析指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之性质是注册会计师与社会公众所“签署”的一份关于职业服务质量的隐性的公共合约。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按照公共合约观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之变迁进行描述与分析。本文采用 Watts and Zimmerman(1983)所采纳的“史证研究”方法,即截取一段期间的历史横截面进行分析,试图梳理出其变迁的大致脉络。囿于篇幅和资料,本文的描述与分析可能会忽略掉一些不太重要甚至较重要的变迁事件。我们的分析主要以英美国家为背景展开,但其变迁过程中所折射出的历史逻辑及规律亦可供我国借鉴。

二、描述与分析框架的构建:基于公共合约观

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其质量难以直接观察,作为职业服务需求者的社会公众面临着与职业服务供给者(注册会计师)之间关于服务商品质量的信息分布严重不对称状态,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如何在交易合约中对会计服务商品的质量做出妥贴与周密的约定呢?实践证明,直接、明

确、量化的约定是无法达成的,只能通过对该种无形商品的生产与提供程序加以约定,从而间接地实现对其质量的控制、保证与提高。因此,对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的生产、提供程序的约定就构成了该商品交易合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可视之为一份子合约。这一约定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关于该商品生产、提供程序的技术方面的约定;其二为关于该商品生产、提供过程中注册会计师与相关利益当事人交互行为方面的约定。在某种意义上,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商品的质量就是这两者的函数。前者作为专业技术,是逐渐累积和发展的,表现为各种专业技术标准(如审计准则等),后者是前者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因为注册会计师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着主观判断(职业判断)及由此伴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后一方面的约定就是职业道德准则,它与前者共同构成了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规范。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在性质上是一份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中的关于职业服务质量的隐性合约,其内容是对职业会计师与相关利益当事人交互行为方面的约定,明确界定注册会计师的行为空间。经过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的长期发展,这些职业行为标准逐渐得到公认和标准化,从而得以从各单份的交易合约中独立出来,由注册会计师职业团体发布,对全体注册会计师均具约束力,成为一份隐性的“公共”合约(陈汉文,1997;陈

汉文、韩洪灵, 2004)^①。从表面上看,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仅是注册会计师职业界自身共同达成的, 但其实质则是作为服务供给者的注册会计师与其需求者(社会公众)所共同“签署”的。

由于现代社会奠基于受托责任网络之上(Ijiri, 1975), 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质量会直接影响经营者、投资者、债权人等社会公众的利益, 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Zeff, 1978)。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 人们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关联, 个人利益便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指数化”(系统的)影响, 这在现代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资产的日益证券化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利益关联度的扩大与提高,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渐由身份关系过渡到契约关系, 血缘和地缘交往的边界被打破, 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脱离”, 在无限的时空中“重组”(郑也夫, 2001)。这样,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从“人格”信任转换到“系统”(包括作为决策基础的信息系统)信任^②。独立审计作为具有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值得信赖的交往媒介, 凭着将人格信任变成系统信任, 以确保陌生人之间承诺的可信性和可合理预期性(Niklas Luhmann, 1997)。正是得到了独立审计制度信任机制的支持, 通过协调与连接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缝合社会信任过渡中的断裂, 才使得人与人之间在保持高利益关联度的同时可以简化直接的交往, 两权分离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因此, 当社会公众之间的经济利益关联度越高时, 一方面, 受托责任信息系统就越趋复杂, 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质量对公众利益之影响就越敏感, 从而导致社会公众(包括政府)对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有效性^③更为关注; 另一方面, 经济利益关联度的大幅度提升可能会致使原有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偏离均衡状态, 从而成为合约变迁的根本动因^④。但是, 当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因经济利益关联度的提高而偏离均衡状态的程度处于一定范围之内时, 并不会立即导致这一合约发生变迁, 为此, 我们引入第二个影响因素——期望差距(expectation gap)。期望差距的产生会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直接的威胁。一方面, 作为职业服务需求者的社会公众会要求政府对注册会计师施以更为严格的管制或法律惩戒, 甚至采取或发明其它替代性的措施以减少对其职业服务的需求(如以政府的直接监督取代某些审计鉴证职能); 另一方面, 始终处于“内省”状态的注册会计师为保持和发展职业服务市场, 会自觉地对其职业道

德标准进行某种程度的反省、提升与改进, 从而促使职业界与公众之间就职业道德准则这一合约达成新的一致, 以弥补期望差距。因此, 期望差距是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变迁的直接动因。

注册会计师职业是一个以保护公众利益为基础实现自身利益发展的职业(Le, 1995), 而在现代政治系统分析模型中, 政府被视为是合作广度最大的集体, 这一特征决定政府必然会以社会公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推动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变迁。此时, 政府以独立和公益者的身份调节公众与注册会计师之间有关职业道德合约签订及其履行问题的争端, 是符合其治理目标的。随着期望差距的不断扩大, 公众会向政府施压以迫使政府重新考虑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的合约安排, 以让公众认可新的合约安排能够弥补这种差距。为此, 我们引入第三个因素——政府管制的参与度。当政府参与

① 在我们看来, 审计业务约定书只是注册会计师与利益相关者或社会公众(广义的委托人)之间有关职业服务约定的显性部分而已(通常以私人合约的形式出现)。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隐性的合约。基于签约效率和信息方面的考虑, 这些隐性合约通常以公共合约的形式出现, 包括审计准则(生产技术方面的约定)、职业道德准则(行为空间与行为导向方面的约定)、质量控制准则(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的约定)、后续教育准则(学习成本投入方面的约定, 由于审计是一种“知识产品”, 所以才有此特别的约定), 甚至还包括审计假设(对不确定环境之反应的一种约定, 此约定最为隐性)。上述约定皆直接或间接地围绕职业服务质量(“质量”是审计服务存在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 且大多以“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

② 开放、流动的普遍交往需要在互不认识的人之间建立信任, 熟人社会的承诺及监督制约机制在社会成员的普遍交往中失去了以往的有效性, 传统的产生于血缘、地域等基础上的可信性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从而寻求对“系统”(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的信任。

③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有效性包括合约本身的有效性和合约履行的有效性。陈汉文、韩洪灵(2004)分析指出, 与特定职业环境相吻合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签订机制可以减少对其履行机制的依赖, 而健全的履行机制可以弥补签订机制的不足; 当签订与履行机制之间出现冲突或摩擦时, 会导致合约的重新签订以提高合约的完全性程度, 从而对合约的运行环境作出适应性调整; 当签订与履行机制构建合理、配置恰当, 能够对其运行环境做出有效反应时, 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我履行, 否则需要强制履行机制以加以补充。本文对合约有效性的描述侧重于其前者, 即合约本身是否与特定的职业环境的理性基础相吻合。

④ 需要指出的是, 仅从逻辑上看, 利益关联度本身并非必然地与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存在这一关系, 这里隐含的一个前设假定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存在职业判断, 从而存在机会主义和自由裁量空间。当存在职业判断时, 注册会计师的行为决策才直接影响公众之利益及其分配, 且利益关联度越高, 这种影响的“杠杆效应”越大, 在此意义上, 利益关联度的提高会成为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变迁之根本动因。如果审计是一个完全“标准化”的过程(不需要职业判断), 那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是不必要的, 因此, 将因职业判断所导致的自由裁量空间限定在符合公众利益的范围之内, 则是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本质功能。

注册会计师行业管制的程度越高时,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就越呈现出政府催生的性质,其合约内容就越要符合政府管制的相关政策之精神,并可能导致合约重签期越来越短。^① 需要指出的是,利益关联度、期望差距和政府管制参与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呈现一种共生的关系,如利益关联度的不断提高会导致期望差距的产生周期(即期望差距的一个波峰到下一个波峰之间的时间间隔)不断缩短,从而更可能引起政府参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制及加强政府管制的程度。这样,在很多情形下,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将受三者合力的共同推动。此外,描述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变迁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合约的不断重签,合约本身的内容、框架及其特征的走向如何?当政府管制的参与度越高或经济交易之环境越趋复杂和多变时,政府为了给其管制提供方便的强制执行机制或公众为了降低其购买的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质量方面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皆可能会影响重签之后具体合约内容的技术特征,如更偏好规则导向^②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为此,我们引入一个特征因素——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技术特征。

这样,本文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重签过程的描述与分析按五个维度^③展开:其一是利益关联度——合约变迁的根本动因;其二是期望差距——合约变迁的直接动因;其三是政府管制参与度——合约变迁的催生剂并影响合约之本质精神;其四是合约的技术特征——合约的内容框架与组织形式;其五是时间,我们的描述与分析是按时序进行的。其中,前三个维度侧重于分析合约变迁的动力机制,第四个维度侧重于描述合约的变迁方向。

三、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之变迁:描述与分析

在过去的一百年注册会计师职业对于维护资本市场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注册会计师遵守最高的行为准则,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一直是被人们高度信任的职业(William S. Kanaga et al, 1987)。故需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与回顾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之变迁。

1. 萌芽期或合约的口头形式:职业道德观念(1905 年及之前)

现代意义上的注册会计师职业是 19 世纪的产物,其存在和进步归功于 19 世纪工商业的大发展(Dickinson, 1904)。19 世纪中、下叶,英国相继成立

了几家会计团体。在这一阶段,英国政府从未尝试去规范进入会计职业界的必要条件。由于当时的会计师几乎不受法律和职业规范的约束,报酬又丰厚,于是许多既无经验、专业水平又低的不称职者自称会计师纷纷涌入公共会计师行列,致使会计师声名狼藉,极大地破坏了会计职业的社会形象。于是,组成职业团体对注册会计师的资格及其与相关利益当事人之间的交互行为进行规范,便成了职业界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就逐渐萌芽出其自身的职业道德观念,如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在其 1882 年的章程中指出“保证会员达到较高水平的专业水准,高质量地遵守职业道德,及时清除违背章程的人”(文硕, 1996), ICAEW 于 1898 年撰写的第一个《会计师法案》(The Accounting Bills)(未获议会通过)也提及职业道德问题,并明确禁止非合格人员使用“会计师”称号。19 世纪末期,随着美国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及个人企业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英国的会计师频繁地访问美国,通过逐月审计为火灾保险公司、铁路以及抵押贷款公司中的英国资本投资提供服务。与英国情形类似,当时美国的注册会计师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吹嘘性广告随处可见。为了克服这一现象以更好地保证服务质量,于是仿照英国的模式,在 1886 年创办了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AAPA),准备确立职业道德标准,纯洁注册会计师队伍。出于英国同行类似的理由和对英国传统的继承,协会也主要通过注册会计师个人的职业道德观念来规范其行为。

当时主要通过个人的道德观念或口头合约来调整注册会计师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其原因在于:
(1) 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联度

① 当然,合约重签期越来越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的经济利益关联度越来越高,因为当利益关联度不断提高时,交易环境日趋复杂和不确定,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与特定时期的环境相吻合的时间也自然被缩短。

② 有趣的是,安然事件后,关于会计准则的导向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其实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也面临着规则导向或原则导向的两难境地,如下文所指出的,世界范围内以“以关系为基础”(relation-based)的职业道德准则正朝着全面实施“概念框架法”(concept framework approach)的方向变革。此外,为什么目前会计行业的相关准则大多以规则导向为显著特征,其背后深刻的形成逻辑和内在的生成机理到底是什么,还有待于学术界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对此亦只是描述其然而未分析其所以然)。

③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每个维度对每次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的影响程度是同样显著的,限于篇幅和重要性原则,我们主要着力于描述那些在特定变迁中影响较为显著的维度,而忽略其中不显著的维度。

在总体上还较低,对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的需求量不大,使用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的公众人数不多,保护公众利益的要求尚不十分激烈,对职业服务质量的要求可以直接在单份的交易合约中作出约定,加之此时的政府基本上还未介入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制中来(低利益关联度下也没必要),从而也就未催生出标准的、书面化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2)当时正值维多利亚时代,注册会计师毫不置疑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素负盛誉的美德倾向性的时代风气之熏染^①,公众的期望差距尚未产生或突出,早期的会计师也把他们的学科(审计)看成本质上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②;加之此时的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尚不发达、职业服务的委托主要是活跃在合约双方驻地的“熟人圈”之中,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诉求更多借助于口头合约(熟人信任)的形式,注册会计师主动的理性选择尚能使这种口头形式的职业道德合约维持一定时期的初始均衡。

2. 探索期或合约的标准化过程:结构化的职业道德准则(1906~1973)

20 世纪初的美国,从事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人数剧增。早期从业者们感到,既然以职业道德观念约束注册会计师行为已显失效,而由公众与注册会计师在每个单份的合约中对服务质量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又太高,因此有必要在职业界内部建立正式的机构,专门研究和制定职业道德标准,将职业道德从私人的口头合约推向标准化的公共合约。

(1) 起点:1906 年职业道德委员会的成立

1906 年, AAPA 建立了一个正式的道德委员会,以制定职业道德标准。这标志着职业界从一般道德概念的理解、内心的体悟、训诫性言辞转而踏上了合约标准化的轨道。然而,要使职业道德成为一份公共合约,必然会影响到职业内部各注册会计师之间以及职业界外部各方的利益,最终与整个职业的生存与发展休戚相关。所以,当由专门的机构来将职业道德从私人的口头合约推向标准化的公共合约时,爆发了一场大争论。

1907 年的大争论,观点有三派。其一,反对制定成文准则的保守派,认为职业道德是一种精神上的崇高追求,难以用准则或公约的书面形式予以规范。代表人物约翰·福布斯曾认为:“为了使注册会计师在公众中树立职业道德规范的印象,必须依赖于注册会计师在某个开业会计师事务所中检验过的经验而进行内在化教育的非正式制度”(转引自梅里诺,1985)。其二,力主制定详细成文准则的激进派,

认为不同职业人员对职业道德这一抽象概念的理解与执行会有偏差,为保证有统一的职业道德行为,职业团体必须以文字形式明确规范职业道德标准。代表人物库珀(Cooper)认为,每一条可能编入准则的行为规章,都应该予以编入。其三,建议制定有限的成文准则的折衷派。代表人物斯特里特(Sterrett, 1907)认为,道德标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发展的,因此编入任何正式的道德准则中的规章都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他坚信,存在着超越任何成文规章的绝对的基本原则,所制订的任何准则只要它们满足当时的需要就是可行的。

当时,执业中的混乱以及史密斯对伦敦保险公司案、金斯顿棉纺织厂案、伦敦石油储藏公司案等导致公众开始对注册会计师产生期望差距,这说明保守派已显不合时宜。但毕竟当时社会的利益关联度还不是很高,公众利益对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质量还不太敏感,加上职业界“重观念轻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激进派的主张亦难以被接受。折衷派切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又与职业内部的接受力相吻合,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1907 年 AAPA 在附则中加上了“职业道德”标题,同时还增加了三条规则,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五条禁令性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每条都以“会员不得……”为开头^③。

这五条合约条款虽勉强通过,但职业界理解并接受其约束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协会没有足够强大的地位制定和实施规则,来自各州团体的代表谨慎地保护着其所在州的权利,他们控制着相关的政策(Carey, 1970)。随后, AAPA 将协会会规强加于各州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五项准则合约条款形同虚设,职业界照常混乱,以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温·赫尔利提出了“地区性专家”计划以取代行业自我管理,这是政府管制最早介入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作为对此的反应,1916 年创

① 著名实践家 Lawrance R. Dicksee(1905)列出了一位注册会计师应具备的素质:“机智、谨慎、坚定、公正、好脾气、勇气、正直、周密、勤勉、判断力、耐心、清醒的头脑及可靠”;“……在会计上,……只有那些力争绝对完美的人,才有望达到不错的中等水平”。

② 比如,1896 年 12 月第一次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审计部分的第一题就是:简述审计人员的职责及其责任。参考答案是:“在缺乏任何法定或具体的解释时,应该从纯理想和道德的观点来看审计人员的职责和责任……”(Broaker et al, 1897)。

③ 这些准则禁止:(1)除会员以外的人使用 AAPA 会员的身份;(2)与外行分享专业收费;(3)不相容工作;(4)未经 AAPA 会员适当的介入或监督而证明会计工作;(5)在商业广告中,会员使用注册会计师或相类似的公共会计师名称,或准许任何组织使用这样的名称,除非所提到的名称是由国家法律授权。

立了美国会计师协会(AIA),以取代 AAPA。

(2) 1917 年:第一份较为全面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

AIA 成立后,被全体会员赋予了制定和实施职业道德准则的权力。于是 AIA 便正式授权职业道德委员会(自其成立 10 年之后)考察和评价会员遵守行为标准的情况。AIA 于 1917 年发表了第一份较为全面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包括八条行为规则^①。该份职业道德准则合约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为以后的合约重签奠定了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未对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提出高要求,保护公众利益未引起政府、公众自身及注册会计师的高度重视,所以这八条准则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极为有限。它深受折衷派的影响,涉及的都是在当时经常发生的、公众已指出的弊端,在今天只归属于职业道德准则的“其他责任和惯例”,但这同时也表明,公众的指责或期望差距会直接导致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修订。

(3) 大危机前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公众对工商界的看法,政府也对工商业采用了自由放任的态度,要求注册会计师把保护工商业的利益看作主要任务,过去为监督工商业而建立起来的并为保护公众利益而从事审计工作的管制机构变得很少关注公众利益了。表现在当时相当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新规则被编入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究其原因,乃是政府的自由放任(“反”或“负”管制),否则,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公众间的利益关联度的提高应该会促使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大幅度重签。换言之,在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变迁的动力中,在实质上有较大提高的利益关联度其所产生的效应被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效应抵消了。

1933 年和 1934 年颁布了体现保护投资者思想的《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并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标志着开始了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正式的外部监管制度(双重管制)。此后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更多地呈现出政府催生的性质,其合约内容也更多地根据政府相关政策之精神而修订。政界对审计工作的兴趣,显示出对职业界不利的一面,那就是鲍拉——奥麦霍尼法案的一条细则规定:所有州际公司的审计应由“注册公司代理人”进行;有人甚至提议成立类似美国最高法院的全国会计工作委员会,取代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注册会计师服务质量要求的日渐提高,且外界对注册会计师服务质量的攻击日愈猛烈。面对这些压力,迫切要求职业界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组织。于

是,美国注册会计师联合会(ASCPA)(成立于 1921 年,当时与 AIA 对峙)与美国会计师协会(AIA)于 1936 年合二为一,并保留后者的名称。1939 年 SEC 决定,协会的道德委员会在涉及协会成员的调查或惩戒行动方面,SEC 将主动提出建议。针对政府直接干预的威胁,协会理事会于 1940 年授权道德委员会调查任何预示着其会员可能违背行为规则的事项,而不管消息来源如何。在此背景下,统一后的职业界明确显示出保护公众利益、提高服务质量的姿态,积极采取行动努力构造和管制会员的行为,对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正,并于 1940 年增加到 15 项准则。

可见,这一时期重新回归审计服务的公众利益导向使利益关联度的提高所产生的变迁动力重新被释放出来,政府首次直接加强了干预的力度、公众要求高质量的职业服务及对现有职业标准的不满情绪三者共同推动注册会计师职业界“重签”其职业服务质量的合约。其中,政府管制力度的增强明显而直接地催生了该次合约的重签,是该次合约变迁中最为显著的动因。由于这次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变迁的幅度很大,从而导致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新的均衡状态^②。

(4) 1973 年:第一份“立体”结构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

进入 60 年代,注册会计师职业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表现在:第一,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第二,大型跨国公司、强大的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机构投资者出现,重新激起了对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免受大企业弊端损害的传统关切。第三,随着社会期望的提高,注册会计师职业界成为公众的视野焦点。^③

① 这八条规则是在 1907 年的五条基础上增加以下三条:(1) 不得故意对反映事实严重失实或严重漏记的财务报表进行证明;(2) 不得通知协会就努力参与制订和修改将对会计实务产生影响的规则;(3) 不得恳求委托人,或侵犯其他协会会员的业务。

② 从 1940 年到 1966 年,几乎没有对职业道德准则进行过正式的讨论。1956 年,协会重新检查了以前发布的职业道德准则,并将注意力放在未曾特别强调的道德问题上,诸如税务业务和管理咨询服务等传统鉴证业务以外的职业道德问题,并将这些规则以单一职业道德规范的形式正式发表。该规范结合职业道德委员会的其他参考意见,于 1962 年被 AICPA 的全体会员正式采纳,并依据注册会计师行为的五个方面加以组织,它们是:(1) 协会会员与客户及公众的关系;(2) 技术标准;(3) 营销惯例;(4) 操作实务;(5) 与协会会员之间的关系。

③ 1967 年 5 月 15 日《福布斯》(Forbes)报指出,注册会计师职业界“正在被迫走出他们十分秘密的世界,进入公众注意的中心”。一项调查表明,一般公众、银行家和投资者把注册会计师的任务描绘得相当广泛。

利益关联度的极大提高导致公众要求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服务以保护其利益的需求十分强烈,而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又固守着传统的对服务质量的约定,即传统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未能及时调整行为以供公众所需求的服务。于是,公众只好通过激进的方式表达其要求了,那就是注册会计师所迎来的“诉讼爆炸”^①。此外,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庭也通过判决不断地扩展了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范围。这一切表明,以前的约定已经不再符合服务需求者的要求,表现为以前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完全消极的格调,使人们对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界能否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保护投资者及广大公众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期望差距(从而这次合约变迁中最显著的直接动因)。

为此,1967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职业道德部发起了对当时的职业道德准则的广泛检查,这个任务是由准则重述特别委员会来具体完成的。委员会对当时的准则进行了逐段、逐字的分析后指出,必须全面修正道德准则。并于1972年5月向协会理事会提交了修正后的职业道德准则,于1973年3月1日正式生效。修改后的准则合约由三部分构成:其一,职业道德概念,这部分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包括五个广义的概念:独立性、正直与客观性;一般标准和技术标准;对客户的责任;对同事的责任;其他责任和活动。其二,行为规则,从概念中推导而成,由15条规则构成。其三,行为规则的解释。1973年至1977年间,又增加了“职业道德裁决”(Ethics Rulings)的部分,概括了行为规则及其解释在各种特殊情况下的运用。

1973年的职业道德准则是变迁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职业道德规范走向了第一个巅峰。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提出了缜密的规范体系,第一次将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从“平面”结构(禁止性合约条款的并行罗列)发展为“立体”结构,是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中在技术特征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新的准则合约条款分四大层次进行^②,四大层次之间相互连贯,由疏到密,互相呼应,共同形成了对注册会计师行为严密有效的控制。这是对职业环境变革(交易日趋复杂)的一种重大反应,使合约更符合其环境的理性基础^③。第二,一反过去惯常的禁止性戒律,提出了职业道德概念(“肯定的道德原则”或“高标准性质的原则”),表述了注册会计师应努力争取的行为和力求达到的目标,体现出注册会计师职业整体对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保护公众利益

所作的承诺和服务于广大投资人的职业形象。

3. 发展期或合约条款的具体化过程:规则导向的职业行为准则(1974年至今)

70年代一系列审计失败案,导致国会参众两院于1977和1978年间就如何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切实保护公众利益等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结果是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各自的法案,要求重新建立会计职业监管制度。在面临这种历史性选择的情况下,AICPA为了避免政府部门对行业监管的全面介入,向国会提出了允许保持行业自律监管的要求。AICPA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自律监管机制,特别是与SEC商议后于1977年成立了公共监督委员会(POB)。POB代表公众利益,通过监督AICPA证交会业务部(SECPS)的同业互查等工作,实现监督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目的^④。这种以POB和SECPS为代表的行业自律监管模式最终得到了美国国会的认同,从而平息了行业面临的信任危机。同时,AICPA也对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这次准则合约的重签鲜明地政府管制参与的催生性质。

8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飞速发展导致公众间利益关联度的极大提升,公众对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保护其利益的期望比以往更高,针对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案件层出不穷^⑤,法庭亦顺应公众之要求,扩大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⑥。1984年美国开始实施《统一会计师法案》,各州的会计事务委员会承担了对会计职业的行政性监督管理职能,加之

① 据《华尔街日报》1966年11月15日的一篇文章估计,仅在1966年后期,就有将近100宗指控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诉讼。另据1968年6月美国《幸福》杂志的估计,在过去的12个月里,指控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案数量足以和过去12年里的诉讼案件数量相比较。

② 尽管第四层次是1973年之后加上的,但立体结构的构建思想在1973年已体现的淋漓尽致,故我们亦将之归功于1973年。

③ 在整个70年代,控告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案大幅度下降,这表明1973年的准则合约是与职业环境相吻合的,从而达到了应有的规范效果。

④ 除了POB和SECPS外,美国AICPA自律监管机制中还包括审计准则委员会(ASB),独立性准则委员会(ISB),AICPA职业道德部(Ethics Division)及其下属的职业道德执行委员会(PEEC)等机构。

⑤ 据估计,在1981至1985年间,美国17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用于打官司的钱已达2亿美元,同期的保险费用则增加了约100%;最大的20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每年支付的失职保险费约在35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

⑥ 比如,在“罗森布罗对阿德勒”案中,法官认为注册会计师对依赖其审计意见的任何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并通过判决使习惯法基础上注册会计师应承担的过失责任扩大到了可预见的第三方。

该段时期 SEC 亦更加深入地介入到行业管制中来。此时,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却因循着传统的与公众的约定,于是注册会计师保持公众信心的能力受到了怀疑,成为公众舆论抨击和调查的焦点。在此背景下,AICPA 于 1983 年 10 月成立了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特别委员会(即安德森委员会),其基本任务是:考察变化了的职业和监管环境,彻底评估现行道德准则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对今后应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安德森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广泛调查与周密分析,在 1986 年发布的《公众期望差距》报告中指出:科恩委员会在报告中所保证的审计责任程度尚未满足公众的期望,在国会、传媒、管理当局和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批评意见中,其中一些合理的关注主要涉及到注册会计师的行为和工作质量。安德森委员会在 1986 年 7 月发布了最终报告:“在日益变化的环境中重构职业行为准则以促进职业完善”。该报告代表着一种对变迁时代的肯定性反应,对职业界一贯重视的概念——公众利益、正直、独立性和客观性、应有的谨慎——赋予了新的活力,并重申了职业界对职业服务和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所作的承诺,从而使职业道德准则合约更加符合变化了的职业环境的理性基础。

根据安德森报告的建议,1988 年 AICPA 对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了全面修正,更名为“职业行为准则”(Code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于 1988 年 1 月 12 日正式采纳。职业行为准则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职业行为准则的原则,第二部分是职业行为准则的规则。至此,以详细规则为导向(rule-oriented)的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准则已初步成型,其他各国也纷纷仿效美国的这一以具体规则为导向的准则体系。此后,AICPA 根据新形势分别于 1992 年、1997 年、1999 年、2002 年和 2003 年对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准则进行多次的修订,使职业行为准则的具体规则更加详细(AICPA, 2002)。这些修订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发展一套详细的“以关系为基础”(relation-based)的独立性规则,以致于降低独立性风险,体现了该职业的传统观念——试图通过限制特定的审计师与客户的关系推进独立性水平和保护公众利益。由于该套规则制定了详细的允许性、限制性关系与交易规则,规定了注册会计师最低可行的标准,也得到了 SEC 的支持。SEC 于 2001 年发布的对审计师独立性的最终规则长达 200 余页,由此可见,以制定详细规则为导向的职业行为准则达到了空前具体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规

则导向准则合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府推动的因素(尤其是 SEC 对独立性问题的强硬态度),其中的可能原因是政府要为其监管提供方便的强制执行机制。

4. 新趋势或合约条款的概念回归过程:概念框架法的职业行为准则(1996 年至今)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英国发生了一系列财务舞弊和审计合谋案。为此,ICAEW 于 1996 年开始按照概念框架法(conceptual framework approach)修订和应用职业行为准则。ICAEW 认为采用概念框架方法制定和实施职业行为准则更有效,这种方法强调注册会计师要按照概念框架法对基本原则加以应用,而不是在以 AICPA 为典型代表的规则导向法下对具体规则的机械遵循(Groom, 2002)。1998 年,ICAEW 公布了核心(基本)原则。ICAEW 认为概念框架法的主要优点有:基本原则有合乎逻辑的指南所支持,能避免对没有特别禁止的行为方式的争论;基本原则简单易懂,几乎能应用于所有的情形,以避免规则导向所带来的刚性过度问题;商业环境和组织的结构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建立原则导向的概念结构才能应对这一变化,而规则导向法则需要更加全面的规则,并不断更新。

安然事件发生后,各国都对本国的职业行为准则进行审查。目前,英国政府、欧洲会计联合会(FEE)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已基本认可了 ICAEW 建立在概念框架法下的职业行为准则,并按该方法进行修订。IFAC 于 2004 年 10 月再度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将概念框架法全面、一致地运用于其职业行为准则。在美国,2003 年 5 月 12 日,AICPA 理事会主席和执行总裁联合写给公众公司会计监管理事会(PCAOB)的公开信再次表明了 AICPA 将会按概念框架法对职业行为准则进行大幅度修订或重新制定。AICPA 的职业道德执行委员会已于 2004 年 1 月发布了一份按概念框架法、与 ISB(2000)类似的《独立性准则之概念框架》,该框架规定了制定独立性准则所应赖以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对独立性风险进行识别与减轻的概念框架分析方法,这表明作为典型的以详细规则导向的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准则也开始遵循概念框架法进行合约条款的概念回归。

从这一阶段的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变迁来看,职业环境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涌现)致使注册会计师在特定情形下对职业道德的判断变得极其复杂且面临大量的道德困境,导致以规

则为导向的职业行为准则总处于落后于现实需要从而被不断修订的过程之中。为了回应这些变化,各国的审计职业界、监管机构开始思考如何变革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准则,从而概念框架法的准则合约开始形成与发展,这是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在其技术特征上的第二次重大转换。

四、结论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的每一次“重签”都是对公众参与的回答,公众参与重签的方式,除直接提出要求之外,更强有力的则是通过法律诉讼程序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随着经济利益关联度的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服务对公众利益的影响越敏感,公众就会更加关注职业道德准则之合约,从而成为合约变迁的根本动因;若公众的这种关注以期望差距的结果出现,那么它就成为合约变迁的直接动因;当政府更多地介入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制中来,合约的变迁又会显著地呈现出政府催生的性质,且合约之条款会包涵政府之意图。在变迁频率上,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利益关联度会越来越高,公众期望差距的产生周期则会越来越短,合约的重签期也越来越短。利益关联度、期望差距和政府管制参与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但不是在每次合约变迁中具有同等的显著效应。此外,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合约之变迁在技术特征上已有两次重大的飞跃,即从“平面”型的合约条款结构转换为“立体”型的合约条款结构以及从详细规则导向转换为概念框架法。

主要参考文献:

陈汉文, 1997, “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准则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
陈汉文、韩洪灵, 2004, “会计职业道德之性质与实施: 一种解说”, 厦门大学会计系工作论文。
G. J. 普雷维茨, B. D. 梅里诺(刘长文译, 常勋校), 1985, “美国会计史——会计文化意义上的历史阐述”, 厦门大学会计系打印资料。
文 硕, 1996, 《世界审计史》, 企业管理出版社。
郑也夫, 2001, 《信任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冯均科, 2004, “审计契约制度: 一种诱致性变迁的发展路径”,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第 6 期。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04, 《注册会计师行业课题研究报告》(第一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AICPA. 1973.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New York.

AICPA. 1986. Restructuring Professional Standards to Achieve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New York.
AICPA. 1997.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A New Concept Framework for Auditor Independence. AICPA website.
AICPA. 2002. A History of Accounting & Auditing Standards. AICPA website.
AICPA. 2003. RE: PCAOB Rulemaking Docket Matter No. 004—Statement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udit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ICPA website.
Broaker et al. 1897. The American Accountants Manual. Vol. 1, New York: p. 45.
Broaker, F. and Chapman, R. 1897. The American Accountants Manual, Vol. 1. New York.
Dickinson, A. L. 1904. Th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ublic Accountant. Price Waterhouse & Co. .
Fusco. 1982. Ethics and Public Accounting. Review of Business, 3
ICAEW. October 2004. Guide to Professional Ethics.
IFAC Ethic Committee. October 2004. ED: Proposed Revised 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ISB. November 2000. Statement of Independence Concept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uditor Independence, ED.
John L. Carey. 1970. The Rise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to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1937– 1969.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Inc.
Joseph. E. Sterrett. 1907. Professional Ethics. Journal of Accountancy, 10.
Lawrance R. Dicksee. 1905. Auditing: A Practical Manual for Auditor, ed, R. H. Montgomery, Authorized American Edition. New York: p. 260.
Macdonald Commission of CICA. 1988.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Public's Expectation of Audits. Toronto.
Michael Groom. 2002. ICAEW Code of Ethics——Approach to independence, oversight and UK developments post——Enron, speech to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CPAs, Beijing.
Niklas Luhmann. 1997. Trust and 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New York.
SEC. November 2000. Final Rules: Revision of the Commission's Auditor Independence Requirements, www. sec. gov.
Stephen A. Zeff. 1978. 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ccountancy, 12.
Treadway Commission: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raudulent Public Reporting, AICPA, 1987.
Watts and Zimmerman. 1983. Agency Problems, Audit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Eviden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XXVI.
William S. Kanaga et al. 1987. Letter to the Membership. Journal of Accountancy, May 9.